

國軍政治教育之學習歷程模式 —結構方程式的探討

余一鳴

政研所

博士

摘 要

「軍事是政治的延長」，世界各國普遍將政治教育視為「主觀文人控制」的重要工具，因此，政治教育的效果特別引人注目。軍隊政治教育多採用政治社會化研究途徑，希望藉此一探求政治教育之效果作為教學改善之憑據。然而從事軍隊政治教育研究學者，多將政治教育視為社會化的媒介之一，往往忽略官兵態度的學習歷程，造成研究結果的失真。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重新檢視社會化歷程，重新評鑑政治教育的效果。經由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政治教育效果來自於同儕、家庭、媒體及軍事生活環境，政治教育僅為中介變項。換言之，官士對於部份政治性議題或觀感早已定形，他們的態度來自於家庭、同儕或媒體的影響，或來自於軍事生活環境等隱性社會化的結果，政治教育僅在於強化即有的認知與態度，當家庭、同儕、媒體或軍隊的隱性社會化對政治產生負面的觀感，政治教育就難以發揮其功效，但其上述媒介社會化結果為正向，則政治教育就成了「政治認知」的倍增器，尤其國人對於政治的冷漠感漸漸消退之後，教育效果更呈現此一趨勢發展。

關鍵詞：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結構方程模式 (SEM)

前言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軍基層志願役軍、士官的政治教育進行調查分析，以了解軍事組織及同儕團體等因素，對軍人政治認知的影響，最後建構一個軍人政治社會化的形成模式。並且將此一整合模式以 SEM 的統計技術來加以檢驗。

首先，研究將探討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形成歷程，根據理論各種不同的社會化媒介，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產生不同的社會化的效果。隨著一個人的成長，社會化媒介 (agent) 在不同時期扮演不同角色，因此在從事社會化研究時應該依不同階段，建構不同的社會化研究架構。換言之，當我們從事社會化研究時，應該考量各時期社會化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而非單純的將之一視同仁。

其次，媒介在社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常是社會科學研究所感興的對象，長久以來學界均將媒介視為社會化研究的重要工具，然而卻往往忽略不同的成長歷程媒介扮演的角色。兒童時期家庭是個人政治常識的重要來源，俟年紀漸長及社會化的內容與歷程的轉換，同儕團體、學校都會扮演輕重不同的角色。此外，受學科研究旨趣的限制，各學科的研究對象往往隨學科的內涵有所不同，新聞學著重媒體的影響力，政治學及教育學著重學校及公民教育的效果，各學科研究各有所長，但卻忽略媒介在不同的社會化歷程所扮演的角色。當然也忽視了能夠系統性探求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政治認知」的中介機制，及媒介相互間的影響力。由於媒介影響力存在複雜因果關係，因此評估變項的影響力必須將其他媒介共同投入參數當中估計，僅就單一媒介進行研究無法正確估計參數影響力，所以，有必要將其他變項加以控制以估算預測變項的影響力。

事實上，已有學者試圖去界定這種社會化歷程與政治態度的形成途徑，Weissberg 與 Beck 就提出不同的社會化內涵與媒介在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的影響力，他們普遍認為隨著個人的成長過程與接觸的頻率，各媒介於各時期存在不同影響力，早期的社會化是後來的發展基礎，隨著個種不同媒介的接觸頻率，家庭及父母的社會化將被同儕團體與學校及媒體所取代。這些看法可以歸結成二個不同的面向說明，其一為政治教育與其他的社會化媒介有同等的影響力，並沒有時間先後之分，因此也不會產生中介變項，二是政治教育僅為其他社會化媒介的中介變項，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在其他的社會化媒介的基礎下發揮效用，當其他機制對政治認識形成負面影響時，政治教育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反之，若早期對政治或政府的認知是呈現正向思維時，後續的政治教育則能夠對個人的政治認識進一步的鞏固及深化。

最後，本研究將整合上述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途徑，建構政治教育對基層

官兵「政治認知」或情感之整合模式，以 LISERL8.54 版的統計軟體來檢驗此一模式的適配度，並且尋找出整個社會化的歷程，使我們對政治教育影響途徑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壹、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教育之相關文獻

長久以來，政治社會化就是研究軍隊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論。因此在探討軍隊政治教育歷程時，有必要藉諸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經驗，進行理論的探討。

一、政治社會化理論

政治社會化之所以被重視，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災禍，因而喚起重新重視教育對人類發展的重要性，而學術界於一九二〇年代起，特別重視古代思想家所謂的公民教育的問題。美國歷史學會於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舉行多次研討會專門討論公民教育，當時學者 B. L. Pierce 主講：「公民組織與青年的公民訓練」，C. E. Merriam 主講：「美國的公民教育」，此為現代政治學推動政治社會化研究背景之一。但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一詞被普遍性的使用，則是在一九五九年 H.H. Hyman 發表《政治社會化》一書後，才使政治社會化逐漸變成了政治學界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轉引自易君博，1990：111-112）。但是實際上政治社會化早已是存在的政治現象，而在一九二〇年代，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與心理學家已著手研究社會化等相關議題，心理學者在研究此問題時偏重於個體層次，而社會學家與文化人類學者著重於總體層次。心理學家研究的重心在於個人是如何在獨特的人格之外，再經由社會化的過程中學習到共同的行為與態度規範。心理學家 G. W. Allport 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於一九二九年提出了「政治態度」的概念，他認為政治態度是由政治認知、政治情感、行為意向所組成的心理或生理組織，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政治情境的反應（轉引自林嘉誠，1989：162）。

文化人類學家則將研究重心置於人類是如何在其相關環境的配合之下產生出不同的文化，同時人類學家也認為，人類社會自古迄今，其所以能維持團結與永續的發展，是因為有一定的共同文化要素作為韌帶及凝固劑（張金鑑，1977）。因此，個人在整個政治生活歷程中必須學習共同的政治文化，做為政治行為之依據，進而使其政治體系得以維持與發展。而個人在政治生活中學習政治文化便是政治社會化。相反的社會學家所偏重的是以總體層次來探討，社會整體的文化與體系是如何將相關的文化結構與規範傳遞下去，使社會文化體系得以持續發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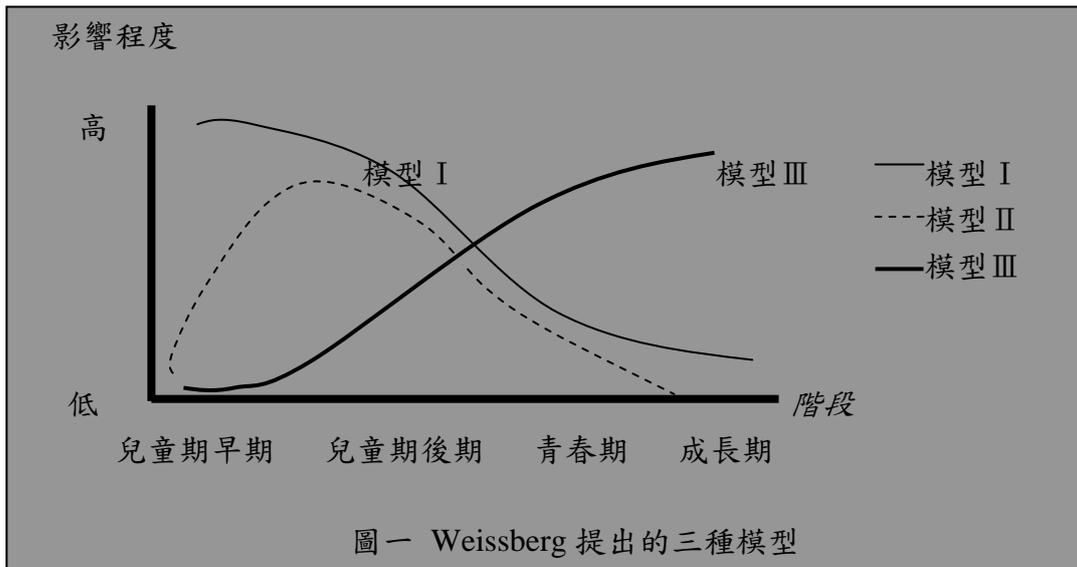
去。社會學家一方面強調個人在社會當中學習所須扮演的角色，以適應環境，謀求生存，而此社會角色扮演經驗會影響及決定各種人的慾望動機、價值取向、行為模式及人生態度。另一方面，為了生存，個人必須學習各種生活模式及行為準則與習慣。這種社會角色的扮演及人格學習內化的過程，有助於解釋政治社會化。此外相關統計工具與測量技術的發達促社會化研究可更進一步發展，也使政治社會化研究有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國內政治學者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始於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代進入黃金時代，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當中，以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傳播媒體等被視為最重要的社會化媒介。家庭對兒童政治社會化的功能最被重視，而其研究成果顯示成效最大，之後的學校、同儕團體、傳播媒體在各個時期均扮演著不同重要性的角色。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學者們應用新的研究途徑，新的研究技術，更肯定家庭角色在兒童政治社會化的功能。此外，在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內容上，經常被用來研究的有：政黨認同、政治功效意識、政治容忍、國家效忠和政權支持（易君博，1990：125-132）等。

二、政治態度形成途徑

就整个人生過程中來看，政治社會化成效在兒童早期、兒童後期、青春期或是成年期影響最大，到目前並無一致的看法，不只是因為缺少相關正確的知識，其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長期性縱貫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有相當的困難度，而其看法如下：Hyman、Greenstein、Esaton 與 Dennis 認為兒童時期的政治學習能力可以持續較久，根深蒂固的觀念對日後的影響力大過於其他時期政治社會化的影響（Hyman，1959；Greenstein，1968；Esaton、Dennis1969）。Almond 與 Verba 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個人的學習能力會隨著年齡與心智的成長，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認知。因此，他們認為成年時期的學習內容較多與政治事物相關，對於政治態度的影響力自然就比較大。這兩種論點對政治學習都可能是有效的解釋，學者研究的結果，兩種論點也都各有證據。不過這兩種論點之間未必有嚴重的矛盾存在，因為各種論點，就不同的政治學習領域而言，都可能是正確的（陳義彥，1979：8）。綜合此二派的說法，Weissberg（1974）提出了三種模型說明學習內容與學習時間的關係（如圖一），他認為政治態度在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學習內容，其中模型 I：遠因模型（primacy model）早期的政治學習內容主要為政治歸屬感（political attachment）及忠貞情操與一般政治意識形態，如總統、國父、國旗、三民主義；模型 II：居間模型（intermediate model）對於政治參與的技術與概念形成，一般性政治知識的學習及一般性的政策偏好；模型 III：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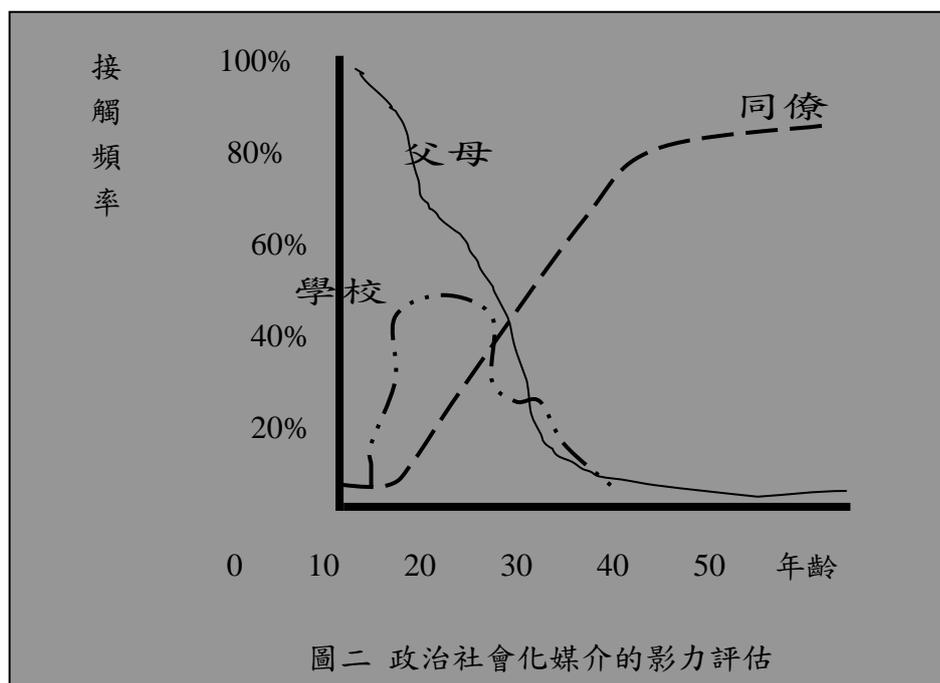
因模型 (recency model) 主要是對於許多在未成年時期所不能瞭解或解釋的各項複雜細節的政治知識、政策、行動的認知與評價 (陳義彥, 1991: 9), 都可能成為成年後的政治學習的重要內容。Weissberg 的重點在於說明學習的社會化內容各時期均不相同, 早期以簡單的政治概念為主, 青春期、成長期則以複雜的政治知識為主。



除了社會化的學習內容隨時間改變之外, Beck (1976) 也提出社會媒介對不同年齡層影響力的評估, 其影響力如圖二所示, Beck 認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 父母、學校與同儕的影響力會有所不同。兒童期父母是子女的態度形成的重要依據, 學齡期間學校是學生態度形成的主要來源, 相對的父母影響力逐次漸弱, 而此時期, 同儕影響力也日漸提升。到了青壯年時期步入社會後, 同儕成為態度形成的主要來源, 這時學校與父母影響力大為下降。Beck 認為這些與個人接觸對象的時間長短有密切關係, 接觸時間愈長影響力愈大。因此, 隨不同年齡層「重要他人」的轉變, 態度的重要影響力也隨之轉變。

據上所論, 我們可以把政治學者對早期政治社會化持續到成年期的發展過程與接觸對象的頻率分析作一總結如下: 早期的學習與後來的發展之間的學習, 是一項複雜的問題, 雖然此項問題並無一致普遍性的答案存在。不過一般學者還是認為, 早期的政治學習受認知能力的影響, 所以多限於寬廣的政治歸屬感和忠貞的學習, 兒童期接觸的時間以父母所占的頻率最高, 所以在兒童時期的實證研究當中可以發現父母的影響力最大, 諸多學者同意早期學習雖然會改變, 但比較其他時期受媒介影響更為持久。隨著年齡的成長接觸的人物開始由「同儕團體」與「學校」所取代,

心智能力也達到一定水準之後，學習內容就開始朝向複雜與細微的政治問題，父母的影響力因而被其他媒介所取代。國內學者郭貞（1996）在比較社會學習、認同發展與家庭溝通模式後認為三種模式交互影響，發現三者交互影響力均存在，也就是說不管任何階段各種社會化的媒介均會產生影響力，不過這種影響力的大小隨著社會情境與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同時在開放多元的文化當中，官方的意識形態與公民教育成效較不如封閉與保守的社會來的好。他們普遍認為多元管道造成多元價值。因此，單一的官方價值不易成為唯一的標準。同樣地，在開放的社會文化當中，父母以概念式的溝通方法，對政治事務較不冷漠，而常看電視或報紙新聞者也較關心政治，在同儕當中經常談論有關公共事務或父母對公共事務較有興趣者也會對政治較關心，相較於個別社會化的媒介，同儕團體的影響力隨年齡增加而提升，父母的影響力隨年齡的增加而下降，媒體的影響力則以接觸時間的多寡而定，接觸的愈多對態度的影響力愈高。國內學者陳文俊（1982）的研究也獲得同樣結果，它分析台灣中學生時認為學校是最具社會化影響力的媒介，其次為大眾傳播媒體。這結果與Beck 及上述其他學者雷同，顯示這個現象並沒有跨文化的差異。Beck 的觀念可適當的移植到國內政治社會化的研究。



資料來源：Beck，1976：177

綜合而言，Beck 與其他學者的看法，認為政治社會化的媒介隨年齡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早期父母的政治態度對子女影響最大，接著學校的影響力日漸提

升，學校教學內容及師長影響力在十多歲時達到顛峰，學生將教師的教學內容奉為「聖旨」。其次，進入國中及高中時期，「同儕團體」及傳媒漸漸嶄露頭角，隨著接觸的時間愈長及為求獲得群體的認同，同儕及傳媒的觀點，漸漸取代其他媒介的影響力，成為政治認知形成的主要來源。雖然 Beck 提出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不同年齡及時期媒介對受試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也獲得後續研究的證明，唯一不同是 Beck 的理論並沒有論及大眾傳播的影響力，不過這不影響 Beck 理論的解釋力，在其他相關的理論與政治傳播的研究當中都述及該媒體影響力亦隨個人成長而有所不同，傳媒的影響力可以說是 Beck 理論的補充，Beck 的理論重點不在於比較各個政治社會化媒介在不同時期影響力的大小，而在說明各媒介接觸影響力與時間成正比，接觸的時間愈多影響力愈高，因此，傳媒的影響力隨著年齡增，接觸的機率漸漸提升，影響力也有愈來愈高的趨勢。同時我們也可以藉由 Beck 觀點導引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並以此比較服役官兵媒介影響力的大小。

由此可見，學者普遍認為政治社會化的媒介並不僅止於個人或正式的組織（政府、宗教團體、利益團體），還包括非正式的組織、政治結構、文化及各種事件，這些都可能成為政治社會化的媒介。不過一般都採取 L. A. Froman 的觀點（1961），以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媒體做為政治社會化的主體，一方面由於容易測量，他方面在於上述的媒介經過多方研究證實，據有一定的社會化成效。基於上述觀點，國內從事政治社會化的學者仍以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傳播媒體，做為研究政治社會化主要的媒介。

三、政治社會化途徑的相關爭議

（一）人格並非社會化研究的對象

Froman 除了強調上述社會化媒介之外，個人的「人格特質」也是影響政治社會化結果的主要因素，個人經由遺傳、環境及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形統整性及持久性的政治態度，最後形成個人的政治定向與行為模式。國內學者陳義彥（1979）及許禎元（2000）就採取類似的研究模式（如附表），並且獲得不低的迴歸解釋力，顯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僅受環境的影響，遺傳因素仍就是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就社會化的理論來看，社會化研究主要著眼於人類在原始的遺傳因素之外，還要經過社會化的學習過程，以習得參與社會所必須具備的能力，研究著重於除了生理的遺傳因素之外，還有那些因素是習得社會技能所須經過的歷程。因此，社會化研究中著重的是「人格」如何受其影響，而非「人格」如何影響社會化的歷程，雖然人格也可能影響政治社會化的結果，

實際上卻是人格與社會化之間交互影響，其間的複雜關係並不容易評估。站在社會化理論的觀點，人格對於社會化的影響並不是研究的重心，即使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重點也是將人格視為社會化的產物，例如 Freud 就認為隨著社會化的發展「超我」(superego) 逐漸成長，「自我」(ego) 就愈朝向社會期待發展，換言之，隨著社會化逐漸深入，人格特質也就愈符合社會期待。顯然就算將「人格」列社會化研究因素，也是將「人格」視為被社會化的原素之一，而非社會化的媒介。總而言之，站在社會化的觀點而言，研究重心在於遺傳因素之外，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因素還有那些，屬於遺傳的「人格」因素自然不是該研究考量的對象之一。

(二) 「個人背景」變項無法滿足統計分析的需要

其次，不少國內的研究採用 Robert D. Hess 及 J. V. Torney 的觀點，將「個人特質」及「社經因素」視為社會化的重要媒介，並將它導入統計模型當中加以評估，其中許禎元(1998)在研究國內大學生時發現「個人背景」變項可解釋變異達 13.5%，具有極顯著的統計水準，不過經過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之後發現僅「就讀學校」所解釋的變異，達到極顯著的統計水準。就統計方法與測量技術而言，將個人背景列入社會化歷程的研究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個人背景」變項多數為類別變項，類別變項所給予的訊息量較少，進行統計分析較不易達到顯著水準。換言之，「個人背景」變項並不能正確代表個人特質。除非另有精細的測量方法。其次，若以 R^2 的增加量比較，通常研究者會將「個人背景」變項最先投入迴歸分析當中，所以有較高的影響力，實際上個人變項往往與其他變項存有過高的共線性，因此，「個人變項」的影響力有高估的現象，況且「個人背景」當中的「性別」、「年齡」與「籍貫」是否能統合成為一個分量表，尚有探討的空間，一昧的將「個人背景」各個變項統合加以分析易容產生測量及統計上的偏誤。

(三) 潛在社會化效果的重要

上述的社會化媒介多屬顯性的社會化媒介，凡事為人所意識而有自覺有目的之社會化都視為顯性政治社會化 (manifes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反之社會化的過程不為人所自覺或意識者則為潛在型的政治社會化 (laten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潛在型的政治社會化會比顯性的政治社會化更具效果，且更富影響力，蓋因個人對後者常存在主觀的心理或不信任的成見，但前者經過時間的遞嬗，往往也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張金鑑，1997：664-665)。一般所稱的顯性社會化有政治教育、政黨的政治宣傳等，而潛在型的政治社會化有家庭生活、同儕團體、休閒活動及生活環境等屬之。一般實證研究都顯示潛在型的社會化比顯性的社會化來的有效。因此我們在進行社會化影響力比較研究時，除了關心不同的

時期的社會化重點，還要考量不同性質的社會化機構對態度的影響。

二、國軍政治教育研究

軍中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在民國 70 至 80 年代最為盛行，¹早期政治教育研究多以政治社會化的理論為研究途徑。實質上，政治教育研究只有引入政治社會化的概念及研究途徑，²其內涵不同於一般學者或學界政治社會化或政治態度上的研究。換言之，國軍政治教育的研究只取其政治社會化的概念與理論，並未（也不必）採取社會化研究的一貫指標（量表），同時國軍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多數成果只是成員暫時性意向的呈現，有別於一般學者以態度量表研究政治社會化。實際上軍隊的政治社會化研究起源相當早，民國六十八年陳驊即以政治社會化理論對國軍的政治教育進行實證性的研究，後續又有鄭輝麟（1982）、華中興（1983）、王夷平（1983）、胡華民（1985）、楊文鎮（1986）等人進行後續研究，早期的研究僅進行簡單的描述統計分析，隨著電腦的普及與統計軟體的視窗化，研究不在限於簡單的相關分析，而進入更高深的迴歸分析，而社會化媒介影響力的比較研究也變為可能。

此外，軍隊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由於受限於研究環境封閉保守的特性，外人想

¹ 請參閱：余一鳴「第一章緒論」表一-1 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態度經驗性研究(1970-1998)〈國軍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以基層部隊士兵與士官為例〉，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八八，頁 17-36。

² 國軍政治教育研究並未完全採取政治社會化理論的研究標的一政治態度，一般國內外研究政治社會化多以此為研究途徑，同時採用政治態度為測量之量表。政治態度(量表)內容包含有政治責任感、政治效能感、政治參與、政治知識與民主信念等。政治教育研究一般以實際教學的內容為問卷標的一思想教育、國是共識教育、生活倫理教育。因此，中西方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除了觀察社會化過程中的各機構（agents;亦有學者譯為媒介）的影響力外，另一個重點即為政治態度形成的來源及現況，而國軍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多針對政治教育的內涵編製問卷，並未如一般政治學研究建立具信、效度及長模的政治態度量表作為測量的指標。因此，可以說一般學者研究政治社會化或政治態度時，有幾個具體的客觀指標，但國軍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則僅針對政治教育的內涵編製問卷，缺乏客觀測量標準。換言之，國軍政治社會化研究內涵不同於一般學者或西方政治學界政治社會化或態度上的研究，國軍的政治教育研究只取其政治社會化的概念與理論，並未採取社會化研究的一貫指標，所以國軍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多數成果只是個別成員暫時性意向調查，有別於一般政治社會化研究量表所呈現穩定性的態度。請參閱：陳義彥，《台灣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六四；陳文俊，〈台灣地區中學生的政治態度及其形成因素—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六七；林嘉誠，〈台北地區大學生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六八；李東明，〈國軍政治教育回顧與展望〉，《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作戰學校研究所，民八七），頁 27-29。

要一窺其堂奧並不容易，若非國防部等相關單位的委託研究，外人是難以進入該研究領域。所以，從事軍隊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多以軍事院校的研究生及教師為主，研究的結果與深度有限。其次，政治教育教學內容與方式除了固定的宣導資料外，莒光日電視教學成為主要的教學方式，³由於定義及觀念見解的不同，使得軍隊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區分為二個主要的研究方向，一者是將莒光日電視教學視為政治教育的主要媒介，採取此觀點者多以新聞傳播的概念探討其功能，另一者則以廣義的政治教育為著眼，將莒光日電視教學視為政治教育的一部份，其他如輔教活動、嘉言選讀、心得寫作、軍法、保防教育等，都視為政治教育的一環。因此，研究的內容與方向均與前者有所差異，採此觀點者多以政治社會化的概念從進行研究。前者著重於政治教育的教學效果，主要從政治社會化的理論評估政治教育對官兵態度的影響效能。後者將莒光日電視教學視為媒體，以傳播理論加以剖析，主要從受眾是如何接觸媒體的公共事務內容；接觸媒體與政治學習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媒體與政治學習的因果關係是直接或是間接的；情境因素對媒體與政治學習間的關係；媒體的使用與政治學習的相關是導源於其他的先在因素。（Chaffee,1977：224-225）依據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者常會在問卷內加入一些「媒體使用」的問題來假設這些答案與政治社會化有關，例如鄭輝麟（1982）及張志雄（1994）將媒體使用為自變項或中介變項，政治教育效果為依變項，以研究相互間的關係。莊淑貞（1992）以凱勒博士（Dr. John M. Keller）提出之 ARCS 學習動機理論為問卷設計之基礎，以瞭解情境因素在媒體政治教育間的關係。總之，這類型的研究主要以莒光日電視教學為自變項，教學的效果為依變項，以解構相互間的因果關係。

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廣義的政治教育研究，相較於狹義的研究觀點有著較為寬廣的視野，不僅針對媒體進行政治教育效果的研究，其他社會化重要的媒介也都能一一的加以考量，這些考量因素不僅能有效的將其他媒介加以控制，防杜政治教育成效評估出現高估的現象，同時亦能有效評估先在因素的影響力。關於這點 Chaffee 就認為父母的行為或政治態度等先在因素會導引孩童獲得媒體的使用習慣及政治興趣。持平而論，以政治社會化概念進行政治教育研究會比政治傳播理論來的有效。因此，本文主要採取政治社會化的觀點進行媒介的比較研究，對軍人的「政治認知」來源進行有效的評估。在軍隊的政治教育研究當中（如附表），

³ 隨著時代的改變政治教育的內涵與方式各有不同，早期政治教育包涵精神講話、政治課程、識字教育、電視教學、訓育活動與輔助教學等，現行的政治教育則以電視教學為主，其他如分組討論及心得寫作都算政治教育的一部份，因此，狹義可以僅指莒光日電視教學，廣義的來說還包涵其他的輔教活動及精神講話等。請參閱余一鳴，2004，〈國軍政治教育內涵與界定之研究〉，《復興崗學報》82期，頁79-106。

研究架構多以自變項為個人背景，加上中介的人格特質、媒體使用、政治教育等變項，對依變項政治教育成效進行評估。早期的政治教育成效評估以多元迴歸的方式進行，後期則以逐步迴歸的方式比較 R^2 的增加量（例如許禎元的研究），由於部份變項間具有多元共線性的情形存在，在分析各變項 R^2 的增加量，通常會有高估的情形，因此各變項投入順序的不同，產生不同 R^2 的增加量，因此有必要引用其他統計方式進行整合性的研究，以改善部份現象高估或低估的情形。

為改進上述研究的缺失，本研究擬採 SEM 方式進行整合性評估。然而，個人背景變項提供的訊息量少，而且多為類別變項，因此不宜進行 SEM 的統計分析。除此之外，尚有其他測量上的問題已於前文敘明，不再贅述。承上所述，本研究並不將「個人變項」列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余一鳴在近幾年研究當中發現（1999;2002;2003）「組織氣候」在影響力預估上表現比其他社會化媒介來得高，該變項可以稱得上是種潛在社會化媒介，此類社會化媒介較其他社會化因素影響力高，是一個不錯的預測變項。同時他認為排除其他的干擾因素，將「家庭政治化」程度、「同儕團體」、「大眾傳播」與「組織氣候」列為自變項，「政治教育」列為中介變項，該架構值得後續進一步嘗試的方向。綜上所述，以往研究社會化有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大眾傳播等媒介。軍隊的研究則以家庭、政治教育、同儕、大眾傳播及近期研究發現所建議的「組織氣候」等為主，至於 Froman 及 Hess 所提的個人特質與人格特質有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與考量，不列入本研究當中。因此，以下僅對「家庭政治化」、軍隊「政治教育」、「同儕團體」及「大眾傳播」及潛在社會化媒介——「組織氣候」做為研究的重點。

本文之所以將「個人背景」因素排除於研究對象之外，並非不贊同 Robert D. Hess 及 J. V. Torney 的觀點，而是個人特質應該有更周延的測量方式，以提供較精確的測量結果，其次是部份的個人特質實際上已包含在媒介的測量當中，若另外進行個人特質的測量，可能造成多元共線性的情況，不利統計分析。因此，余一鳴建議以上述四項為自變項，政治教育為中介變項是較為可靠的研究架構。而本文亦採取該建議進行後續研究。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受試者抽選國軍基層部隊志願軍士官，以基層連隊為抽樣單位，採配額抽樣法，共抽取 450 位。配額方式係依國軍各軍種兵力分配比為依據。抽樣方式先依各軍種兵力員額，分配各軍種抽樣人數，再依各軍種在各地區兵力分

佈人數，分配各地區各軍種抽樣人數。為求各地區人員均能兼顧，總共抽取北、中、南、花東、金門、馬祖及澎湖等六個作戰區，各作戰區再依部隊特性平均分配至各旅級單位，最後由各旅級單位依各基層連隊特性分配未執勤人員參與抽測。為求合乎母體人數比例，要求受測各部隊依部隊特質平均分配受測人數。由於受測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各部隊任務，以求抽取之樣本盡量符合母體各項特質。資料蒐集完畢後，依各問卷架構進行資料登錄和編碼，運用個人電腦以 SPSS12.01 版處理，再交由 LISREL8.54 版運算模型適合度。問卷則以集體式填答方式進行，問卷內容以立克式 (Likert) 封閉型量表，經剔除作答不完全等廢卷資料，有效問卷 424 份。

二、研究工具與變項

本研究主要收集工具為陳義彥 (1975;1991)、陳驊 (1977)、林嘉誠 (1980)、華中興 (1983)、陳文俊 (1983;1997)、楊文鎮 (1986)、張志雄 (1994)、郭貞 (1997) 及余一鳴 (1999;2002;2003) 所編製的政治態度量表，除「大眾傳播」信度較低 (.78)，其他都高達 .85 以上。依據本研究之概念模式，採用該問卷當中部相關的問題做為研究變項。詳述如后：

(一) 外因變項

1. 觀察變項：

(1) 家庭政治化：「家庭政治化」的測量主要由家人對公眾事務的興趣高低而定，包含以上四題。「家人收看公共事務的報導」；「與家人談論公共事務」及「家人參加公眾活動」，從「從不」(得一分)到「常常」(得四分)。「家人對公共事務有沒有興趣」，從「一點也沒有興趣」(得一分)到「很有興趣」(得四分)，得分愈高代表「家庭政治化」對官兵的政治認知影響力愈高。

(2) 同儕團體：「同儕團體」指對個人「政治認知」影響程度的測量，主要以個人是否與他人談論政治問題、接受程度等面向所構成。「在部隊中可以與他人安心的談論政治議題」；「常不常與弟兄談論政治議題」；「從朋有中獲知政治訊息」及「接受弟兄政治事務的觀點」，從「從不」(得一分)到「常常」(得四分)。得分愈高代表「同儕團體」對官兵的「政治認知」影響力愈高。

(3) 傳播媒介：傳媒觀察變項的測量與媒體使用時間及受影響程度而定，包含「看電視新聞」及「看報紙的政治新聞」的時間，從「從不收看」(得一分)到「約六〇分鐘以上」(得八分)，「接受媒體的觀點」及「引用媒體的觀點」從「從不」(得一分)到「常常」(得四分)。得分愈高代表傳媒對個人的「政治認知」影響力愈高。

(4) 組織氣候：「組織氣候」是組織成員對組織結構、工作特性與人際關係的感受及認知所形成的一組屬性，對組織成員的行為有所影響。組織成員在組織當中的主觀感受，即一般認知的組織氣氛。當組織氣候好有助於獲取員工的認同，贏得員工的向心，是一種無形的內在動力，這股內在動力。一般學者認為由底下幾個構面形成，工作環境是否愉悅、組織對外環境是否具機動性、內部作業是否具穩定性、成員是否具競爭性、組織制度、工作精神、同事情誼、主管領導與方式等。「組織氣候」不僅測量官兵對單位的認同，運用於政治教育研究更有不錯的預測，關於這點余一鳴（1999;2002）在基層士官兵的研究當中獲得證實，他認為軍事組織具有官方的色彩，服役環境的好壞往往會直接投射到「政府」及「政治」的認知，因此「組織氣候」具有影響「政治認知」的效果，且高於其他媒介的影響力，是軍事組織當中無形的社會化媒介。本研究測驗的內容包含「我的長官會跟同仁的家人連絡，並告知在部隊的工作表現」；「我的直屬長官做決定之前，會考慮同仁的想法」；「我的長官會注意安排合適的資深弟兄，給予新進同仁適當的照顧」；「單位在面對裝備檢查或各項驗測時，因為總是提早規畫」；「本單位非常強調革新，鼓勵成員獨特的創意」；「本單位的業務銜接，因為總是提早歸畫，所以總是很順利進行」，共六題每題選項，從「極不同意」（得一分）到「極同意」（得六分）。得分愈高代表單位「組織氣候」對個人的「政治認知」影響力愈高。

2. 潛在變項：本研究之外因潛在變項有四個，分別為「家庭政治化」、「同儕團體」、「傳播媒介」及「組織氣候」。

（二）內因變項

本研究之內因變項依據因果關係的鋪成，分為兩類變項，首先是作為中介機制的中介變項。此類變項為「政治教育」，此仍本文主要探究的研究標的。其次為結果變項。上述的變項皆為內因潛在變項，是由內因觀察變項所建構，有關的內因觀察變項描述於后：

1. 中介變項

本研究中介變項為「政治教育」，測量內容主要來自於華中興（1983）張志雄（1994）與余一鳴（1999）的「政治教育」量表，該內因潛在變項是由四個觀察變項所組成，此四個觀察變項皆與「政治教育」經驗有關。主要是測量「你收視莒光日電視教學時專心嗎？」從「很不專心」（得一分）到「很專心」（得四分）；「你對莒光日電視教學內容是否了解」從「很不了解」（得一分）到「很了解」（得四分）；「你贊不贊成電視教學對國內外大事的看法」從「很不贊成」（得一分）到「很贊成」（得四分）；「在莒光日電視教學後你是否常會主動參與討論」從「從不」（得一分）到「常常」（得四分），得分愈高者代表受「政

治教育」影響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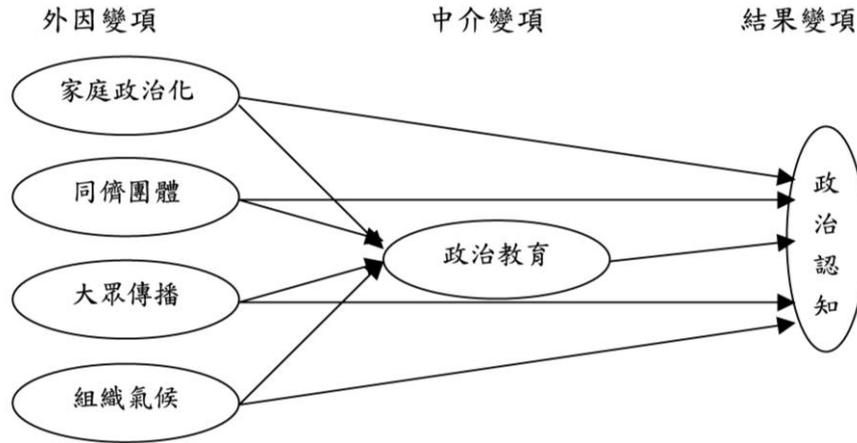
2. 結果變項

本研究結果變項為「政治認知」，「政治認知」量表係根據 Easton 與 Hess (1961) 三項觀察指標而來，這三項指標為第一類為「權威當局」(government)，第二類為「政治典則」(the regime)，第三類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第一項為「權威當局」共有四題，由「綠色矽島」、「查賄」、「管制赴大陸投資」及「兩岸直接三通」所構成。第二類「政治典則」由「投不投票對政治影響不大，所以我不常參與投票」、「每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去投，所以自己投不投，沒有多大關係」、「政治是少數人的事，與多數人無關」、「投不投票對政治影響很大，所以我經常參與投票」等四題組成。第三類「政治社群」亦由四題所構成分別為，「保家衛民是軍隊的首要工作」、「不管是本省人或是外省人，都是軍人保護的對象」、「軍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衛國家安全」及「軍人就是要效法『先烈先賢』保國衛民的精神。」每題都是六分題，從「極同意」(得六分)到「極不同意」(得一分)。因此，得分愈高代表官兵愈有正向的政治認知。

參、研究假設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政治教育、傳媒、同儕團體是影響「政治認知」的主要來源，根據 Back 及其學者的看法，青壯年的「政治認知」奠基於兒童及少年期的政治態度上，就時間發展的先後順序，家庭、同儕及傳媒與社會化的環境因素應早於軍隊的政治教育，上述四項除了直接影響政治態度的形成，也會透過「政治教育」間接途徑影響「政治認知」。根據上述文獻的探討結果我們做出以下的研究架構(如圖三)，做為以下研究設計及假設驗證的依據。其中家庭政治化、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及組織氣候列為自變項，而「政治教育」雖然也會影響官兵的態度，但主要的影響力是奠基於其他自變項的影響，所以將「政治教育」視為中介變項，最後，才形成「政治知識」。



圖三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分別由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二者構成，其測量的內容與結構路徑分述如下：（如圖四）

（一）測量模式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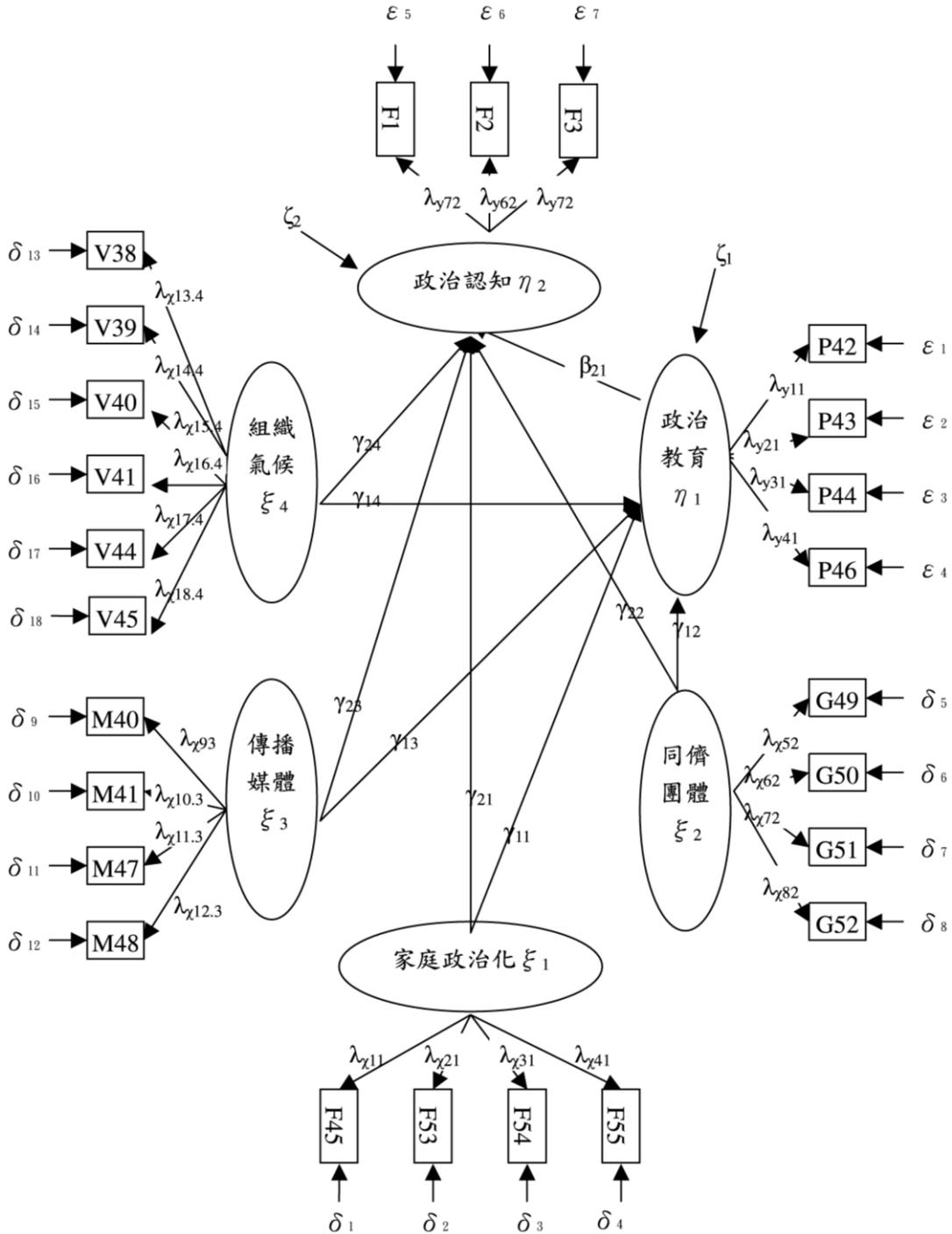
1. 「家庭政治化」為一外因潛在變項。由「收看公共事務」、「討論公共事務」、「參加公眾活動」及「公共事務的興趣」等四個外因觀察變項所組成。

2. 「同儕團體」為一外因潛在變項。由「可以安心討論公共事務」、「接受同儕公共事務的觀點」、「從同儕中獲取政治訊息」及「與同儕談論重大新聞」等四個外因觀察變項所組成。

3. 「傳播媒體」為一外因潛在變項。由「引用媒體的觀點」、「接受媒體的觀點」、「看電視新聞的時間」及「看報紙政治新聞的時間」等四個外因觀察變項所組成。

4. 「組織氣候」為一外因潛在變項。由「業務提前規劃」、「鼓勵創意」、「新進人員的輔導與照顧」、「工作提前規劃」、「與家屬聯絡」及「考慮同仁的想法」等六個外因觀察變項所組成。

國軍政治教育之學習歷程模式—結構方程式的探討



圖四 政治教育對政治認知影響之假設模式路徑圖

5. 「政治教育」為一內因潛在變項。由「收看公共事務」、「討論公共事務」、「參加共眾活動」及「公共事務的興趣」等四個內因潛在變項所組成。

6. 「政治認知」為一內因潛在變項。由「綠色矽島」、「查賄」、「管制赴大陸投資」、「兩岸直接三通」、「政治典則」、「投不投票對政治影響不大，所以我不常參與投票」、「每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去投，所以自己投不投，沒有多大關係」、「政治是少數人的事，與多數人無關」、「投不投票對政治影響很大，所以我經常參與投票」、「保家衛民是軍隊的首要工作」、「不管是本省人或是外省人，都是軍人保護的對象」、「軍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衛國家安全」及「軍人就是要效法『先烈先賢』保國衛民的精神。」等內因觀察變項所組成。
矩陣方程式及方程式轉化成向量形式如下：

$$\begin{array}{l}
 X = \\
 (18*1) =
 \end{array}
 \begin{array}{l}
 \Lambda_x \\
 (18*4)
 \end{array}
 \begin{array}{l}
 \xi + \delta \\
 (4*1) + (18*1)
 \end{array}$$

$$\begin{array}{l}
 \chi_1 \\
 \chi_2 \\
 \chi_3 \\
 \chi_4 \\
 \chi_5 \\
 \chi_6 \\
 \chi_7 \\
 \chi_8 \\
 \chi_9 \\
 \chi_{10} \\
 \chi_{11} \\
 \chi_{12} \\
 \chi_{13} \\
 \chi_{14} \\
 \chi_{15} \\
 \chi_{16} \\
 \chi_{17} \\
 \chi_{18}
 \end{array}
 =
 \begin{array}{cccc}
 \lambda^{x_{11}} & 0 & 0 & 0 \\
 \lambda^{x_{21}} & 0 & 0 & 0 \\
 \lambda^{x_{31}} & 0 & 0 & 0 \\
 \lambda^{x_{41}} & 0 & 0 & 0 \\
 0 & \lambda^{x_{52}} & 0 & 0 \\
 0 & \lambda^{x_{62}} & 0 & 0 \\
 0 & \lambda^{x_{72}} & 0 & 0 \\
 0 & \lambda^{x_{82}} & 0 & 0 \\
 0 & 0 & \lambda^{x_{93}} & 0 \\
 0 & 0 & \lambda^{x_{10.3}} & 0 \\
 0 & 0 & \lambda^{x_{11.3}} & 0 \\
 0 & 0 & \lambda^{x_{12.3}} & 0 \\
 0 & 0 & 0 & \lambda^{x_{13.41}} \\
 0 & 0 & 0 & \lambda^{x_{14.4}} \\
 0 & 0 & 0 & \lambda^{x_{15.4}} \\
 0 & 0 & 0 & \lambda^{x_{16.4}} \\
 0 & 0 & 0 & \lambda^{x_{17.4}} \\
 0 & 0 & 0 & \lambda^{x_{18.4}}
 \end{array}
 \begin{array}{l}
 \xi_1 \\
 \xi_2 \\
 \xi_3 \\
 \xi_4
 \end{array}
 +
 \begin{array}{l}
 \delta_1 \\
 \delta_2 \\
 \delta_3 \\
 \delta_4 \\
 \delta_5 \\
 \delta_6 \\
 \delta_7 \\
 \delta_8 \\
 \delta_9 \\
 \delta_{10} \\
 \delta_{11} \\
 \delta_{12} \\
 \delta_{13} \\
 \delta_{14} \\
 \delta_{15} \\
 \delta_{16} \\
 \delta_{17} \\
 \delta_{18}
 \end{array}$$

$$Y = \Lambda Y\xi + \varepsilon$$

$$(7*1) = (7*2) (2*1) + (7*1)$$

$$\begin{bmatrix} y_1 \\ y_2 \\ y_3 \\ y_4 \\ y_5 \\ y_6 \\ y_7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1 & 0 \\ \lambda^{y_{21}} & 0 \\ \lambda^{y_{31}} & 0 \\ \lambda^{y_{41}} & 0 \\ 0 & 1 \\ 0 & \lambda^{y_{62}} \\ 0 & \lambda^{y_{72}}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eta_1 \\ \eta_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varepsilon_1 \\ \varepsilon_2 \\ \varepsilon_3 \\ \varepsilon_4 \\ \varepsilon_5 \\ \varepsilon_6 \\ \varepsilon_7 \end{bmatrix}$$

(二) 結構模式設計

1. 「家庭政治化」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2. 「同儕團體」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3. 「傳播媒介」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4. 「組織氣候」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5. 「政治教育」影響「政治認知」。

矩陣方程式及方程式轉化成向量形式如下：

$$\eta = \Gamma \xi + \beta \eta + \zeta$$

$$(2*1) = (2*4) (4*1) + (2*2) (2*1) + (2*1)$$

$$\begin{bmatrix} \eta_1 \\ \eta_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gamma_{11} & \gamma_{12} & \gamma_{13} & \gamma_{14} \\ \gamma_{21} & \gamma_{22} & \gamma_{23} & \gamma_{24}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xi_1 \\ \xi_2 \\ \xi_3 \\ \xi_4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beta_{21} & 0 & 0 \\ 0 & 0 & 0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eta_1 \\ \eta_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zeta_1 \\ \zeta_2 \end{bmatrix}$$

(二) 結構模式設計

1. 「家庭政治化」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2. 「同儕團體」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3. 「傳播媒介」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4. 「組織氣候」影響「政治教育」及「政治認知」。
5. 「政治教育」影響「政治認知」。

矩陣方程式及方程式轉化成向量形式如下：

(三) 假設模式之規定:

1. 每一觀察變項皆有一個不是零的負荷量 (nonzero loading, λ) 其所建構的潛在因素上，但對其他的潛在因素之負荷量是 0。
2. 觀察變項與觀察變項間所連結的測量誤彼此之間不相關。
3. 潛在變項的殘差項與測量誤差項之間不相關。

參、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 LISREL8.54 版的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主要是用於評鑑本研究所建構模式之適配度。根據 Jöreskog and Sörbom (1993) 的建議，本文將從整體適配度與結構適配度兩方面來評鑑。由於本研究樣本數不大約 400 份，因此採用 ML (maximum likelihood) 進行估計。

一、模型修飾

模型整體適配度分析尚稱理想，WLS 卡方值為 888.66 (df=260, p=.00)，卡方自由度比為 3.418，大於 2，RMSEA=.076; NNFI=.93; CFI=.94，均達 .90 的標準；儘管如此，此模型仍有修正的空間。由於該模型仍有修飾的空間，因此我們利用 MI 指數來檢查可以進行增加的參數。修正時我們仍優先考量理論及量表設計的合理性，經過上述因素及參數的考量後，認為潛在內衍變項「同儕團體」影響 V45 的因素負荷量參數 (MI=165.07)。其他的參數不是測量殘差就是修正後並不合乎理論與量表編製上的需求，因此僅進行 V45 的修正。「同儕團體」影響 V45 的因素負荷量參數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表示「同儕團體」這一個潛在變項影響了個人對長官決策的信心，當「同儕團體」影響力愈高，有助於個人對長官決策時的信心，因此，納入修補參數當中。

二、整體適配度分析

經過模型修飾之後整體適配度有顯著改善 (表一)，在絕對適配度指標之 GFI 與 AGFI 分別為 0.88 及 0.85，略小於接受值 0.90，RMSEA=0.05，小於 0.080，ECVI=2.0，小於獨立模式之 ECVI 值，但大於飽和模式，絕對適配指標在模型上仍有改進的空間，顯示模型與實證資料尚有一段距離。但在相對適配指標當中 NNFI、NFI、IFI、CFI 及 RFI 值都大於 0.90，顯示模型可以接受。在簡效適配指標上來看，Normed Chi-Square=2.76，介於 1.0 與 3.0 之間，PNFI 與 PGFI 值都大

於標準值 0.5，AIC 為 1180.71，小於飽和模式與獨立模式 AIC 之值，符合接受的要求，但 CN 值小於接受值 200。整體而言，絕對適配指標未能通過接受值的要求，但相對與簡效適配指標皆通過所要求的接受值，顯示模型與實證資料尚有段距離，但在模型的建構上卻合於理論上的要求。

表一 修正模型適配度考驗指標

絕對適配指標
(1) Chi-Square with 259 Degrees of Freedom = 715.43 (P = 0.0)
(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88
(3) Standardized RMR = 0.072
(4)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65
P-Value for Test of Close Fit (RMSEA < 0.05) = 0.00
(5)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ECVI) = 2.00
90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ECVI = (1.82 ; 2.20)
ECVI for Saturated Model = 1.54
ECVI for Independence Model = 26.29
(6)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0.85
相對適配度指標
Chi-Square for Independence Model with 300 Degrees of Freedom = 11069.72
(7)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95
(8) Normed Fit Index (NFI) = 0.93
(9)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5
(10)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 0.95
(11) Relative Fit Index (RFI) = 0.92
簡效適配度指標
(12)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 = 0.80
(13)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 0.70
(14) Independence AIC = 11245.97
Model AIC = 1180.71
Saturated AIC = 2291.16
(15) Critical N (CN) = 177.29
(16) Normed Chi-Square $715.43/259=2.76$

四、模型內在適配評鑑

經由統計分析當中(如表二),除了「G52」及「G51」觀察變項的負荷量,其t值未大於1.96,其餘觀察指標皆達顯著水準($p < .05$)。也就是說,除了「G52」及「G51」之外的其他觀察變項在反映其所形成的潛在變項上是有效的。其次,我檢查這六個潛在變項中,哪一個觀察變項對潛在變項建構的貢獻最大。要了解此一問題,乃是檢驗完全標準化解,此解提供標準化的參數值。對「政治認知」而言,在建構效度上「F1」最大,其次為「F2」,最後為「F3」。對「組織氣候」而言,「V41」最大,依序為「V44」、「V40」、「V39」、「V45」,最小為「V38」。對「政治教育」而言,「P44」建構效度最大,依序為「P43」及「P45」,最小為「P42」。「大眾傳播」而言,「M47」建構效度大,依序為「M48」及「M41」,最小為「M40」。「同僚團體」而言,「G49」建構效度大,依序為「G51」及「G50」,最小為「G52」。「家庭政治化」而言,「F53」建構效度大,依序為「F54」及「F45」,最小為「F55」。

表二 潛在變項對觀察變項的參數估計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lambda_{\gamma 11}$.70	0.02	2.31	.69
$\lambda_{\gamma 21}$.75	0.05	2.02	.78
$\lambda_{\gamma 31}$.73	0.02	1.98	.72
$\lambda_{\gamma 41}$.62	0.05	2.12	.63
$\lambda_{\gamma 52}$.48	0.22	1.97	.46
$\lambda_{\gamma 62}$.58	0.05	1.99	.59
$\lambda_{\gamma 72}$.73	0.05	1.90	.74
$\lambda_{\gamma 82}$.62	0.06	1.89	.69
$\lambda_{\gamma 93}$.82	0.12	2.30	.80
$\lambda_{\gamma 10.3}$.73	0.13	2.26	.71
$\lambda_{\gamma 11.3}$.80	0.25	3.01	.82
$\lambda_{\gamma 12.3}$.12	0.02	1.97	.08
$\lambda_{\gamma 13.4}$.39	0.06	2.01	.37
$\lambda_{\gamma 14.4}$.88	0.21	2.59	.85
$\lambda_{\gamma 15.4}$.89	0.25	3.01	.86
$\lambda_{\gamma 16.4}$.93	0.26	3.12	.93
$\lambda_{\gamma 17.4}$.89	0.15	3.01	.88
$\lambda_{\gamma 18.4}$.01	0.02	1.98	.001
$\lambda_{\nu 11}$.92	0.12	3.02	.94
$\lambda_{\nu 21}$.65	0.23	2.89	.60
$\lambda_{\nu 31}$.49	0.12	2.05	.45
$\lambda_{\nu 41}$.69	0.14	2.36	.62
$\lambda_{\nu 52}$.85	0.02	2.89	.87
$\lambda_{\nu 62}$.83	0.05	2.87	.84
$\lambda_{\nu 72}$.75	0.09	2.89	.74

* $P < .05$

從表三當中的觀察變項間測量誤之非標準化係數，可以看到所有的測量誤皆具顯著水準。也就是說，此一觀察變項皆具測量誤存在。顯示觀察變項合乎測驗原理。

表四為潛在變項之建構信度與平均抽取變異量，從表中可以看出，「家庭政治化」、「同儕團體」、「組織氣候」及「政治認知」第四個潛在變項在變項的建構信度大於 0.6，表示觀察變項對此四個潛在變項提供可信的建構測量。從平均抽取變異量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與「政治教育」其值皆小於 0.5，顯示對此兩個潛在建構而言，測量誤比起觀察變項更具有貢獻。

表三 觀察變項之測量誤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δ_1	.52	0.02	1.98	.52
δ_2	.39	0.15	2.23	.39
δ_3	.48	0.09	2.12	.48
δ_4	.60	0.12	2.31	.60
δ_5	.79	0.22	2.22	.79
δ_6	.65	0.03	2.19	.65
δ_7	.45	0.06	2.19	.45
δ_8	.52	0.14	2.18	.52
δ_9	.36	0.28	2.20	.36
δ_{10}	.49	0.11	2.13	.49
δ_{11}	.33	0.09	2.16	.33
δ_{12}	.99	0.05	2.18	.99
δ_{13}	.85	0.03	2.14	.85
δ_{14}	.28	0.06	2.08	.28
δ_{15}	.26	0.14	2.09	.26
δ_{16}	.14	0.28	2.03	.14
δ_{17}	.23	0.13	2.22	.23
δ_{18}	.35	0.23	2.28	.35
ε_1	.94	0.12	2.01	.94
ε_2	.60	0.01	2.03	.60
ε_3	.45	0.08	2.19	.45
ε_4	.62	0.21	2.01	.62
ε_5	.24	0.03	2.27	.24
ε_6	.31	0.06	2.22	.31
ε_7	.45	0.18	2.05	.45

表四 潛在變項之建構信度、平均抽取變異量與解釋量

潛在變項	建構信度	平均抽取變異量	R ²
家庭政治化	.80	.50	
同儕團體	.80	.52	
大眾傳播	.71	.38	
政治教育 (η_1)	.46	.34	.48
組織氣候	.88	.61	
政治認知 (η_2)	.86	.61	.37

四、結構模型檢定

此一部份在於檢定政治社會化學習模型是否受到資料的支持。檢驗的內容包含估計參數的方向性、量的 R²。由表四與表五中可以看出除了「家庭政治化」對「政治教育」(-1.41)及「政治教育」對「政治認知」(1.29)未達顯著水準外，其他皆達顯著水準。且潛在變項間的解釋量都達一定水準。

在參數方向性上理論並沒有特別的訴求，但根據經驗研究「家庭政治化」、「同儕團體」及「大眾傳播」愈高者，通常受「政治教育」影響者愈小，呈現反向關係，同樣的這三個媒介在「政治認知」的傳播上也呈現負相關，不過這中間涉及複雜的族群因素，因此沒有絕對的標準及影響方向，同時在參數方向性上並沒有特別的理論要求。所以，在參數估計上並沒有任何方向性的主張。研究中發現「家庭政治化」(-0.22)、「同儕團體」(-0.13*)與「組織氣候」(-0.26*)的影響力愈高，則「政治教育」的影響力就愈低，不過「家庭社會化」並未達顯著影響力，表示「家庭政治化」並未對官兵對「政治教育」的接受程度，但「同儕團體」與「組織氣候」則會影響政治教育的接受程度，接受這二媒介觀點的人較不受「政治教育」的影響。而接受「大眾媒體」(0.63*)的觀點者，同時也較接受「政治教育」的觀點。

表五 潛在變項與潛在變項間的參數估計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數估 計值
γ_{11}	-0.18	0.13	-1.41	-0.22
γ_{21}	0.47	0.23	2.02*	0.31
γ_{12}	0.08	0.03	-2.04*	-0.13
γ_{22}	0.19	0.06	3.17*	0.23
γ_{13}	0.51	0.14	3.59*	0.63
γ_{23}	-0.75	0.28	-2.69*	-0.49
γ_{14}	-0.12	0.03	-3.47*	-0.26
γ_{24}	0.32	0.06	5.22*	0.38
β_{21}	0.23	0.18	1.29	0.12

*P<.05

在「政治認知」方面，「大眾傳播」(-0.49*) 受影響愈大者，對「政治認知」呈現負面的觀感，然而在「家庭政治化」(0.31*) 與「同儕團體」(0.23*) 並非一般預期呈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家庭政治化」與「同儕團體」影響官兵的「政治認知」，愈受這二個媒介影響的官兵，對政府與政治理念愈有正確的認識，同樣地，「組織氣候」對官兵「政治認知」一樣呈正向的影響力，「組織氣候」愈佳的單位，對政府的評價愈高。總而言之，「政治教育」受「大眾傳播」與「組織氣候」的影響，其中以「大眾傳媒」影響力最高，其次為「組織氣候」與「同儕團體」。在「政治認知」方面，同樣一「大眾傳播」影響力最高，其次依序「組織氣候」與「家庭政治化」，最後才是「同儕團體」。

五、理論的剪裁

從上面的結果顯示，整個模式適合度可以接受，但是有些理論的關係並未被資料所接受。此顯示，可能有界定誤產生。換言之，模型中界定了沒有影響性的關係存在。因此，有必要重新進行理論的界定，將無影響力未達顯著水準的關係去除，如此方能達到簡效的原則。

研究者依據統計結果設定三個模式(如表六)，其中模式一是經過修定的原始模式，但原始模式當中 L1 -> L5 及 L5 -> L6 未達顯著水準，顯示這二個關係並不存在於模型當中，有必要刪除後加以計簡模型適配度，刪除 L1 -> L5，RMSEA 適配度更佳，且自由度增加 χ^2 只有增加 0.56，是一個不錯的建議，若再刪除 L5 -> L6 形成模式三，但在其他適配度指標不變的情形下， χ^2 增加 2.49 並不利於整體適配度的發展，而且但刪除 L5 -> L6 則又出現 L1 -> L6 顯著度降低到標準以下，顯示「L1」與「L5」對「L6」並不據影響力。

表六 理論剪裁之適配度統計摘要表

模型	去除參數	χ^2/df	CFI	ECVI	RMSEA	$\Delta\chi^2/\Delta df$
1		715.43/259	.95	2.00	.065	
2	L1 -> L5	716.19/260	.95	2.00	.064	0.56/1
3	L1 -> L5 L5 -> L6	718.58/261	.95	2.00	.064	2.39/1

表七 最終修正模式之潛在變項與潛在變項間的參數估計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γ_{21}	0.40	0.20	2.02*	0.27
γ_{12}	-0.08	0.03	-2.49*	-0.18
γ_{22}	0.19	0.06	3.17*	0.22
γ_{13}	0.32	0.05	6.03*	0.41
γ_{23}	-0.65	0.22	-2.94*	-0.43
γ_{14}	-0.12	0.02	-3.75*	-0.28
γ_{24}	0.32	0.03	5.19*	0.37
β_{21}	0.15	0.16	1.03	0.08

*P<.05

如果我們採用模型三，甚至發展成模型四將「L1」的效果完全刪除，我們會發現整體適配度有下滑的趨勢，不合乎理論簡效的原則，雖然仍有 β_{21} (1.03) 未達顯著水準（如表七），但理論仍以模型二為主。（如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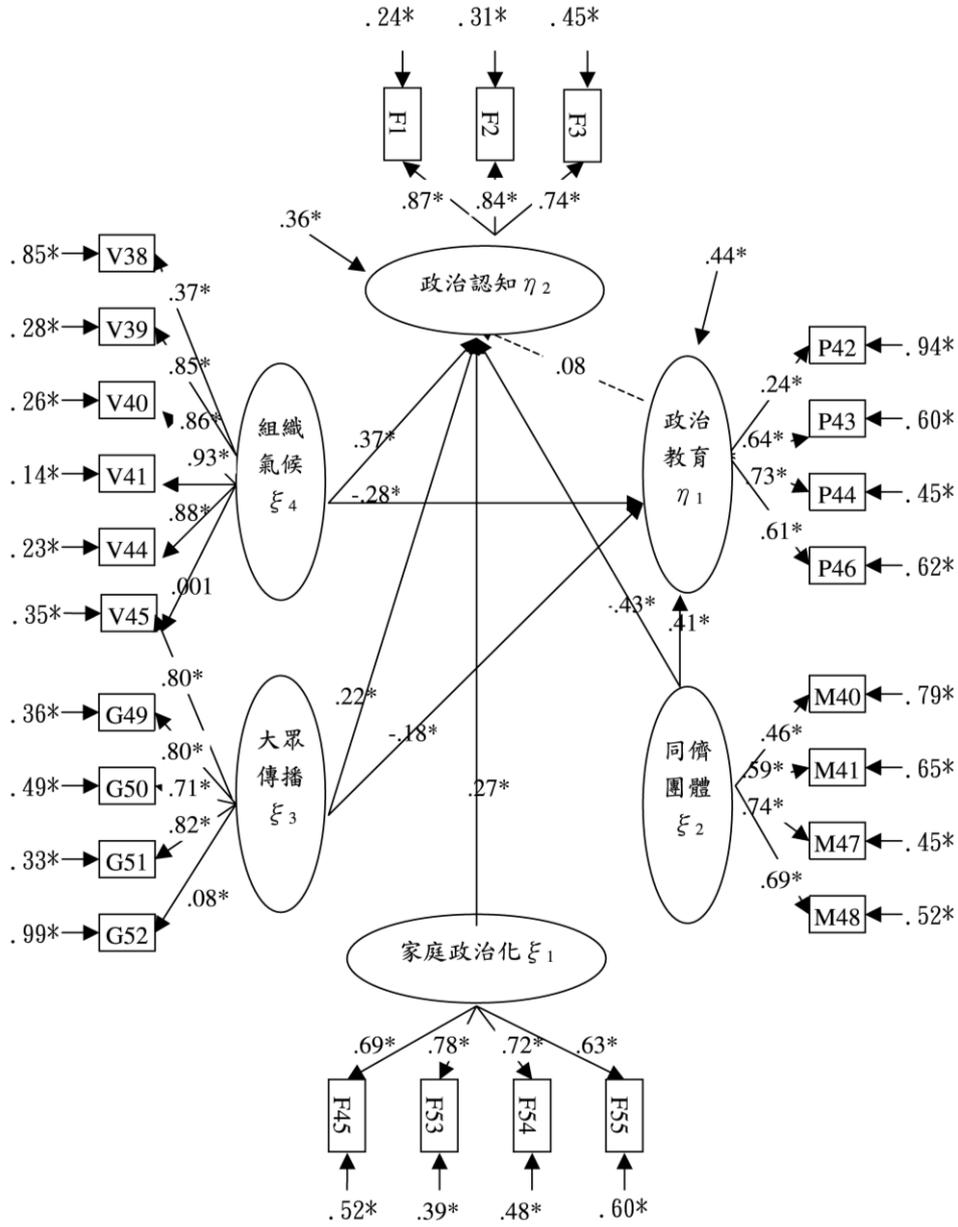
肆、討論及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軍政治認知形成主要途徑，藉由結構方程式分析發現「政治認知」形成主要途徑有以下七條：

- 1.同儕團體→政治教育-->政治認知，其效果為： $(-0.18) \times 0.08 = -0.01$
- 2.大眾傳播→政治教育-->政治認知，其效果為： $(0.41) \times 0.08 = 0.03$
- 3.組織氣候→政治教育-->政治認知，其效果為： $(-0.28) \times 0.08 = -0.02$
- 4.家庭政治化→政治認知，其效果為：0.27
- 5.同儕團體→政治認知，其效果為：0.22
- 6.大眾傳播→政治認知，其效果為：-0.43
- 7.組織氣候→政治認知，其效果為：0.37

上述的七個形成途徑，前三者的影響力對「政治認知」並未達顯著水準，雖然「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及「組織氣候」會影響「政治教育」的效果，但並未能透過「政治教育」間接對「政治認知」產生影響（.08，未達顯著水準）。換言之，官兵「政治認知」主要來自於「同儕團體」、「大眾傳播」與「組織氣候」等三媒介的影響，其中以「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最大，而且呈現負向關係，也就是說愈受該媒介影響者，對政府的認知愈負面，反之愈正面。其次為「組織氣候」也就是單位領導方式愈開明，長官愈能體恤部屬，單位官兵之間相處愈融洽，對政治及政府愈有好感，反之愈差。最後，「同儕團體」對「政治認知」的影響力相對較小（0.22），但呈現正向關係。上述的模型直接證實 Back 的看法，父母與學校的影響力在青壯年時期大幅滑落，而同儕的影響力相對提升，在加上媒體與無形社會化的媒介，形成服役期間的官兵「政治認知」的主要來源。而「政治教育」是不是服役官兵「政治社會化」的主要途徑，則需要更多的研究

加以檢驗，雖然該參數 (β_{21}) 的估計未達顯著水準，但模型三的整體適配度等各項指數並不如模型二，所以「政治教育」是否為該時期官兵政治社會化的主要途徑，仍有必要再加以深入研究，若斷然宣稱「政治教育」並非官兵政治社會化的主要來源推論過於粗糙與武斷。但可以確證的是，不管採用模型二或模型三，都顯「政治教育」與「家庭政治化」程度影響力遠不如其他三者。



圖五 政治認知形成途徑最後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估計 (註:虛線代表未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不僅針對社會化的歷程提出假設，更針對各社會化影響途徑進行比較，同時比較有形及無形社會化的功效。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將無形社會化--「組織氣候」列為重要政治社會化媒介之一，雖然部份學者同意無形社會化影響力的功效，也有部份學者從事類似的研究，但多數研究仍以有形社會化媒介做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對於無形的社會化媒介甚少探討，從事類似研究者，也沒有將隱性社會化媒介視為研究的重心。一般社會化的學者認為無形社會化的功效高於有形社會化媒介，有形社會化來自於有意識及目的社會化媒介與手段，目的在於灌輸某種特定政治意涵或組織意識，這種主觀作為，一般都會被受化者所意識而產生排斥，較難以能達到預期的社會化效果，尤其在高度開放的社會環境當中，社會化的管道多元，有形社會化的效果就更難控制，它的社會化內容常與事實相矛盾。無形的社會化多來自於無意識，沒有特定的手段，社會化的內涵多元，受化者在無意識的情形下受影響，以組織氣候為例，它的內涵與手段就包括組織結構、人際相處、領導風格等，這些方式都成為無形社會化的一部份，隱含於日常生活中，當個人浸淫於此等生活環境當中，自然潛移默化了一些觀念而不自知。這種沒有目的之社會化型態，社會化的效果最佳，所以社會學普遍認為無形社會化的功效較有形的為佳。這個觀點在本研究中也直接獲得證明。

雖然無形社會化有極佳的社會化影響力，但組織氣候是如何影響官兵的政治認知？一般而言，服役官兵極容易將單位的效能與管理方式良窳等同於政府機關的表現，單位「組織氣候」的好壞，直接投射到官兵對政府的印象上。軍隊是政府部門之一，軍隊效率、風氣與表現的好壞都會直接影響官兵對政府的評價，單位具有效能、長官言行一致，關愛部屬，官兵及家屬自然對政府及政治有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很容易影響官兵的「政治認知」，並投射於問卷的表現上。相反地，軍隊內部管理、法令規定、軍官素質及管理型態不佳，士兵會將這些觀念投身到政府或政治的印象上，認為政府是一個無效率、官僚的組織，因此服役單位「組織氣候」的良窳直接影響官兵的政治認知。

此外，就整體影響力而言（如表八），對「政治教育」整體因果關係的影響力評估上，以「大眾傳播」的影響力最高（.41），其次，為「組織氣候」（.37），複次，為「家庭政治化」程度對政治教育的影響力（.27），最後為「同儕團體」的影響力（-.18）。其中「同儕團體」對於「政治教育」呈負向關係，顯示同儕影響力愈高，政治教育的效果愈低。換言之，同儕社會化的內涵與軍隊政治教育的內涵不同，當官兵愈受同儕影響，政治教育的效果就愈差，反之，當愈接受政治教育影響者，同儕的政治影響力就愈低，同儕會影響官兵對「政治教育」的接受度，愈受同儕影響者，政治教育愈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總而言之，「大眾傳播」對「政治教育」影響力最大，其次才是「組織氣候」與「家庭政治化」，同

時上述三者有助於官兵對政治教育的接受，相形之下「同儕團體」的影響力相對較小，而且愈受到同儕影響者愈不能接受政治教育。對「政治認知」整體因果關係的影響力評估上，依舊是「大眾傳播」最高(-.40)，其次為「組織氣候」(.35)，「同儕團體」的影響力相對較小(.24)，其中「大眾傳播」呈現負向關係，顯示「大眾傳播」不利於官兵「政治認知」的形成，愈受「大眾傳播」影響者，對「政治認知」愈呈現負向的觀感。上述認知的影響力多來自於直接效果，間接受「政治教育」的影響並不高。也就是說，同儕、媒體與單位的組織氣候是官兵形成政治態度的直接來源，透過「政治教育」間接影響官兵認知的效果並不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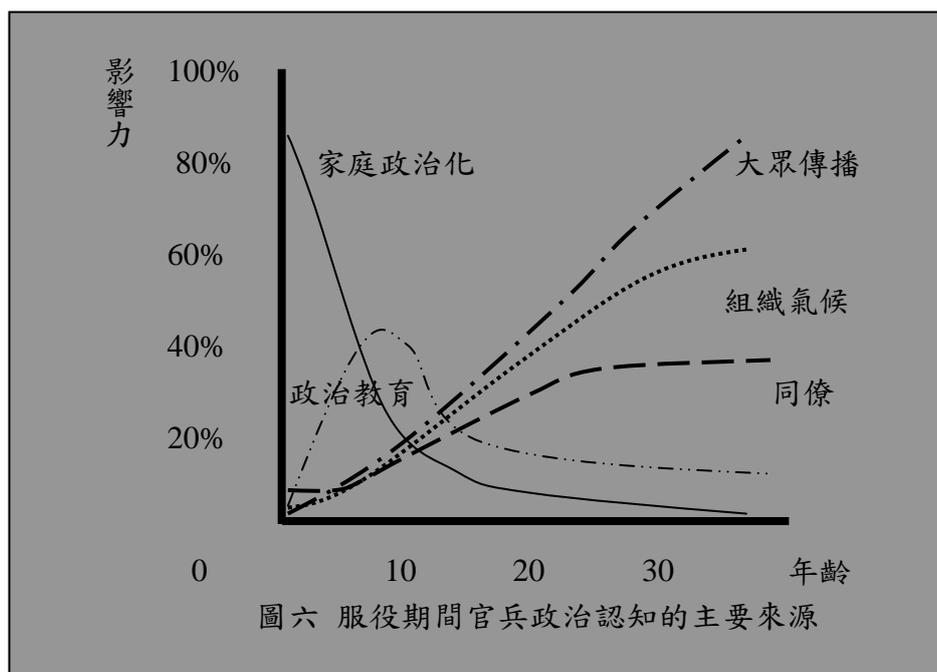
表八 潛在變項間因果關係表

潛在變項	內衍潛在變項			
	政治教育		政治認知	
	估計值	標準化值	估計值	標準化值
家庭政治化				
直接效果	.40*	.27		
間接效果(經由政治教育)				
整體效果	.40	.27		
同儕團體				
直接效果	-.08*	-.18	.19*	.22
間接效果(經由政治教育)			.03	.02
整體效果	-.08*	-.18	.22*	.24
大眾傳播				
直接效果	.32*	.41	-.65*	-.43
間接效果(經由政治教育)			.06	.03
整體效果	.32*	.41	-.59*	-.40
組織氣候				
直接效果	-.12*	-.28	.32*	.37
間接效果(經由政治教育)			-.02	-.02
整體效果	.32*	.37	.30*	.35

*P<.05

從表八及上述七項形成途徑中可以清楚的發現，官兵的「政治認知」主要來自於「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及單位的「組織氣候」的直接影響力，是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力相對較低，這點與 Beck 主張相似。受化者隨者年紀的增長，接觸的對象從幼兒時期以家庭為主，學齡時期的學校，後逐漸脫離父母及老師的影響，青少年期漸漸以同儕及媒體為主，到了職場又以工作環境為主態度的形成途徑。因此，服役期間官兵態度的主要來源逐漸以媒體、同儕及單位的組織氣候為主。此外，從 Beck 的理論及本文的研究結果，足以說明官兵的「政治認知」主要受媒體、同儕及單位的組織氣候影響，家庭與學校影響力已大幅度下滑，尤其服役期間官兵已脫離家庭與學校生活，「家庭政治化」的程度及軍隊「政治教育」

自然無法成為官兵態度的主要形成途徑。此外，「大眾傳播」及「組織氣候」的影響力亦如余一鳴歷年的調查結果相似，綜合上述理論探討及實際驗證的結果，可以確證「同儕團體」、「大眾傳播」與「組織氣候」是官兵「政治認知」的主要形成圖徑。根據上述研究本文將服役期間官兵的形成途徑調製成圖六。



上述觀點充份說明「身教重於言教」，不管「政治教育」工作做的多徹底，教學內容設計的多活潑，都抵不上長官的言行不一，部隊違法犯紀。改善官兵「政治認知」的根本之道，在於我們應該培養道德高尚言行一致的領導軍官，不能任人唯才，而是要任人唯德，唯有從各級幹部的品性要求做起，才是導正官兵視聽的最佳良方。因此，各軍官學校及幹部進修班隊應列為「政治教育」的重點對象，唯有教育出言行一致、品德高尚的幹部，才能促使部隊政治教育發揮應有的功能。

參考書目

- 王夷平，1995，〈軍校生政治文化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
- 余一鳴，1999，〈國軍基層部隊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以士官兵為例〉，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
- 余一鳴，2002，〈國軍莒光日政治教育問卷調查〉，國防部九十一年度政治教育

專案研究。

- 余一鳴，2003，《國軍莒光日政治教育問卷調查》，國防部九十二年度政治教育專案研究。
- 易君博，1990，《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
- 林嘉誠，1989，《政治心理形成與政治參與行為》。台北：商務。
- 胡華民，1993，〈中正預校學生政治功效意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
- 張世昌，1997，〈國軍通識教育學術研究會論文集〉，《憲兵學校政治教育目標與實踐之研究》，頁 168-208。
- 張志雄，1994，〈國軍官兵收視莒光日節目與國家意識之關連性研究〉，國軍莒光日電視教學節目開播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
- 張金鑑，1977，《動態政治學》。台北：七友。
- 莊淑貞，1992，〈「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激發學習動機策略之研究-以「大兵週記」單元之「認識著作權法」為例〉《國軍「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開播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作戰學校，頁 279-324。
- 許禎元，1998，《分裂國家主權意識形成途徑之研究》，台北：時英。
- 許禎元，1998，〈媒介接觸行為與國家意識之相關研究〉，《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戰學校，179-196。
- 許禎元，2000，《職業軍人的政治學習—制度與行為》，台北：雙葉。
- 郭貞，1996，〈台灣地區大專學生政治態度之形成〉，《政治學報》，27 卷，頁 165-199。
- 郭貞，1997，〈台灣地區的政治社會化：行為層面的探討—政治社會化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 II〉，國科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6-2412-H-018-B2。
- 陳驊，1977，〈國軍政治教育功能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
- 陳義彥，1977，〈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義彥，1982，〈台灣地區中學生政治態度及其形成因素—青少年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義彥，1991《我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華中興，1983，〈我國軍事院校學生政治社會化之探討—價值目標、政治教育與政治態度之分析〉，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
- 楊文鎮，1986，〈我國軍事校院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

文。

- 鄭輝麟，1982，〈國軍莒光日電視教學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
- Beck, Paul Allen, 1976, The Role of Agent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Stanley Oenshon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 Free Press.
- Chaffee, Steven H., Marilyn Jackson-Beck, Jean Durall, & Donna Wilson, Mass Communication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Stanley Allen Rensh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Free Press, 1977, pp. 224-225.
- Easton, David, & Robert D. Hess, 1961,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Seymour M. Lipset & Leo Lowenthal (eds.) ,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N.Y.: The Free Press. Pp.228-231.
- Easton, David, & Jack. Dennis, 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 McGraw-Hill.
- Froman, L. A. Jr., 1961,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23, p.343.
- Greenstein, Fred I., 1968,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Daido L. Sills, et al (ed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4. New York : The Macmillan.pp.550-556.
- Hess, Richard D., & Judith V. Torney,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ldren, Chicago: Aldine, p. 228-231.
- Hyman, Herbert H.,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Jröeskog, K. G., & Sörbom, D.,1993, LISREL 8: User's reference guide, Chicago: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 Weissberg, Robert W., 1974, Political Learning, Political, Choice,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Hall, Inc.

附表 歷年有關國軍政治教育調查研究資料

研究者	題 目	研究架構	主 要 研 究 發 現
陳 驊	〈國軍政治教育功能之研究〉，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變項：個人背景 中介變項：政治教育 依變項：政治態度	1.問卷編製根據研究須要，並無明確之理論。 2.國軍官兵在政治認識上，對中央政治體制、政治過程及政治權威人物的認知相當高。官兵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高，服役年資愈長，對基本政治知識的認識也愈多。 3.受測官兵對「閱讀或討論國內外重大要聞很感興趣」有很高的政治興趣，官兵的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高、服務年資愈長，政治興趣也愈高，大陸省籍的官兵比本省籍的官兵政治興趣要高。 4.受測官兵對政治教育教學評價並不十分滿意。受測官兵對政治教育傳播媒體運用的頻率不低，依次為輔教影片、革命軍、青年日報、勝利之光、國魂。 5.對政治教育傳播的運用頻率，以空軍官兵接觸多，海軍官兵較少。
鄭輝麟	〈國軍莒光日電視教學之研究〉，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1.問卷編製根據研究須要，並無明確之理論。 2.受測官兵認為電視教學「個個專心」16.05%、「大多專心」44.19%、「多數專心」20.03%、「半數人專心」8.45%、「少數人專心」10.16%，「無人專心」1.3%。
華中興	〈我國軍事院校學生政治社會化之探討—價值目標、政治教育與政治態度之分析〉，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變項：個人因素、社會因素、投考動機、就讀興趣 中介變項：政治教育 依變項：政治態度（五大信念）	1.依據 G. A. Almond & Sidney Verba 政治文化三取向，認知、情感、評價。 2.大多數的學生反映，對政治相關課程的學習，超過百分四十的人未能專心聽講，其原因是，內容教條氣息太重及教學方法刻板。 3.軍校管教方式經迴歸分析達顯著影響力。 4.對於政治教育教學因素影響最大的是基於個人意願的投考者，以及年級愈高的學生，此兩者都認為其受到政治教育的幫助最大。
王夷平	〈中正預校學生政治功效意識之研究〉，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變項：家庭背景、學校因素、地理環境 中介變項：人格特質 依變項：政治功效意識	1.依據楊國樞與瞿海源的「現代人格量表」及楊國樞修正 T. W. Adorno (F-scale) 「權威人格量表」 2.受測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與其校方的領導方式評價呈顯著關連，但與隊職官的領導方式評價無顯著關連。 3.權威人格與現代性人格與政治功效意識相關。 4.領導方式的評價為開明者，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愈高。
華民	〈軍校生的政治文化〉，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變項：個人因素及社會因素 中介變項：	1.軍校生平日所接觸媒介以「報紙」為主（3.26時/週），其次「雜誌」，再其次是「電視」（2.85時/週）。 2.家長接觸媒體，對個人的看法有影響，

		媒介使用程度 依變項：政治知識	時間越長影響越深。 3.影響軍校學生職業價值觀最主要的因素是成就動機，其次是社會背景，再其次為家庭背景和大眾媒體。 4.影響職業評價，最主要原因是「積極進取」的價值態度愈傾向於選取挑戰、冒險、權力、責任、績效、創新等價值項目的學生，對軍人的職業評價愈高。
楊文鎮	〈我國軍事院校學生政治文化之研究〉，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變項：個人因素及社會因素 中介變項：人格特質 依變項：政治態度	1.問卷編製根據研究須要，並無明確之理論。 2.就整體趨勢而言，軍校學生的政治文化是傾向於高度國家認同、低「省籍觀念」、中上程度「民主信念」、對「政府認知」分散，但有深厚情感、對基本政策高度支持的整合性政治文化。
張志雄	《國軍官兵收視莒光日節目與國家意識之關連性研究》，國軍莒光日電視教學節目開播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政戰學校。	自變項：人口特質 中介變項：收視行為 依變項：國家意識	1.官兵個人特質不同而在收視行為上產生的差異，最突顯者為「對莒光日播出內容的瞭解程度」，其次為「專心程度」。 2.國家意識中「軍人職責」與收視莒光日行為有顯著相關。 3.專心程度方面：有九成的官兵認為收視莒光日電視教學節目均「非常專心」或「大部分專心」。 4.官兵收視情境：有 72.1% 表示單位「非常重視」，22.6% 認為「還算重視」，僅 5.1% 表示單位「不一定重視」或「不重視」。
莊淑貞	〈「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激發學習動機策略之研究-以「大兵週記」單元之「認識著作權法」為例〉《國軍「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開播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政治作戰學校	自變項：學習者個人因素 中介變項：教材適合度 依變項：學習動機	1.以凱勒博士 (Dr. John M. Keller) 提出之 ARCS 學習動機理論為問卷設計之基礎。 2.莒光園地節目之大兵週記單元中「認識著作權法」專集，在引起官兵「注意」、「相關」、建立學習「信心」與「滿足」等四項策略分析，官兵皆持正面評價。根據凱勒所提出之理論將有助於提高官兵學習興趣，而在收視時不專心或容易分心，則不易激發官兵學習動機。
張世昌	《憲兵學校政治教育目標與實踐之研究》，〈國軍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憲兵學校。	自變項：個人因素 中介變項：政治態度 依變項：政治教育成效	1.無理論依據。 2.學員生對國家都具有強烈的認同感。 3.政治教學評價中最有興趣及最有收穫的「政治教育課程」，為「莒光園地」、「憲兵勤務之政治作戰」、「心理輔導」。 4.«不同背景»學員生在接受「政治教育»後，所產生的個體成效也會有所差別。
許禎元	《媒介接行為與國家意識之相關研究：政戰學校等三所學校政治社會化的比較》，〈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政戰學校	自變項：個人特質及社會因素 中介變項：媒體接觸時間	1.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社群、典章制度與權威當局為量表建構之基礎， 2.軍校生「偏愛報紙」與國家意識呈顯著正相關，而「讀報時數」則與國家意識呈顯著負相關。 3.«看電視時數»與「國家意識»有負向相關。

國軍政治教育之學習歷程模式—結構方程式的探討

	政治研究所。	依變項：國家意識	
許禎元	影響軍校政治學習因素探討—八十六年反共愛國教育個案調查》，〈復興崗學報〉，65期。	自變項：性別、校別、院別 依變項：政治學習	1.無理論依據。 2.若就全部十八個變項投入比較，則成就動機中的「科系滿意度」為最重要的作用項，解釋力達到.094為最高，其次為「校別」，作用力達.034，再其次為「時事討論次數」，其R ² 增加量為.008。
華中興	《從學生學習動機看軍校政治教育精進方向：個案分析》，〈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	無	1.學生對公眾事物的看法影響力來源依序為，(1)同學與學長；(2)報紙；(3)軍校老師；(4)父親；(5)雜誌期刊；(6)電視電影；(7)軍校隊職官；(8)色校外的朋友；(9)就讀軍校前的師長；(10)兄弟姐妹；(11)色校教育方式與規範；(12)莒光日教學、專題講演；(13)軍校政治教育課程。 2.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政治通識課程」收獲程度之間成正相關，即學習動機高，其學習收獲亦高。 3.各年級「學習動機」與「政治課程收獲」間呈顯著相關，而非正式課程收獲的相關程度又大於正式政治課程。
余一鳴	《國軍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以基層官士兵為例》，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變項：個人因素及社會因素 中介變項：家庭政治化、媒體、同儕團體、組織氣候、政治教育 依變項：政治態度	1.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社群、典章制度與權威當局為量表建構之基礎。 2.軍隊政治教育對官兵政治態度影響最大，其次為單位效能與領導風格，尤其對於軍人規範、軍人特質的形成與政府評價的影響最大。 3.«單位效能»佳與長官體恤部屬的部隊，在政治態度的形成上有較正向的結果，反之則會對「軍人特質」、「公民責任」、「軍人規範」與「文武關係」產生較低的認知，對政府有較正面的評價與較高的「一元領導」觀，這顯示在一個較為民主與組織氣候佳的環境中，有較好的社會化效果。其中「單位效能」對「政府評價」可以產生.107的R ² 影響力。
許禎元	《職業軍人的政治學習—制度與行為》，臺北：雙葉。	自變項：個人背景 中介變項：人格特質 依變項：政治態度	1.政治態度由政治冷漠感、政治功效感、公民責任感與政治無力感構成。 2.民主價值取向以現代性人格、媒體與家庭較高。
余一鳴	《國軍莒光日政治教育問卷調查》，國防部九十一年度政治教育專案研究。	自變項：個人因素及社會因素 中介變項：家庭政治化、媒體、	1.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社群、典章制度與權威當局為量表建構之基礎。 2.組織氣候的影響力高於其他中介變項的影響力，顯示無形化的環境因素是政治教育中最具影響力的媒介。

余一鳴

		同儕團體、 組織氣候、 政治教育 依變項：政 治態度	
余一鳴	《國軍莒光日政治教育問卷調查》，國防部九十二年度政治教育專案研究。	自變項：個人因素及社會因素 中介變項：家庭政治化、媒體、同儕團體、組織氣候、政治教育 依變項：政治態度	1.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社群、典章制度與權威當局為量表建構之基礎。 2.中介變項當中以組織氣候影響力最大。

(投稿日期：94 年 6 月 15 日；採用日期：94 年 8 月 9 日)

國軍政治教育之學習歷程模式—結構方程式的探討